

冯文治



中国文化
近代转型管窥

商务印书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笔者从文化史视角考察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在《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等专著中有所阐发，又主编专议此题的论文集《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巴蜀书社 1988 年出版），以后续有相关文章发表，集成《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商务印书馆 2010 年出版）。今次修订补充商务印书馆本，辑为本书。诸篇成文，时间跨度三十余年，所议事项（包括陈列之数据）多有迁衍，今编保持旧文原貌，以见历史轨迹。

转型界说 / 1

近代中国：多层次变革交叉互叠 / 2

近代转进三期说 / 11

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 / 14

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光明日报》访谈录） / 26

张之洞从清流党到洋务派的转变 / 37

张之洞治鄂：华中腹地由中古向近代转轨 / 54

“冲击—反应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

两种转型说的长短得失 / 60

中国文化人历史递变：巫史—士大夫—知识分子 / 69

转型中的知识分子 / 79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总序 / 84

《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 / 91

“五四”运动与文化转型——2016年春访谈录 / 108

文化体制变革的文化史探究 / 116

探索文化转轨的新创获——读耿云志主编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 121

革命平议 / 131

革命：社会转型的激进形态 / 132

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渊源 / 135

鲁迅笔下的辛亥革命 / 142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序 / 153

- 辛亥革命研究两岸互动 / 157
- 商务印书馆《大革命写真画》再版序 / 162
- 中华书局《辛亥革命图志》前言 / 168
- 临危受命吴将军 / 170
- 李西屏——革命阵营翘楚 科教兴国前驱 / 174
- “改革运动健将”范熙壬 / 176
- 《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 200 首》序言 / 179
- 王国维对日趋革命化的近代中国变局的预见 / 182
- 近代革命论的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186

开放历程 / 213

- “开放”释义 / 214
- 走出“原始封闭” / 217
- 华夷交会“诸文明”互动 / 220
- “胡服骑射”与《谏逐客书》的文化开放内蕴 / 224
- 筑城“自守”与“勤远略” / 228
- “丝绸之路”得名 / 234
- 丝绸之路开辟动因（甲）：军事外交 / 236
- 丝绸之路开辟动因（乙）：商贸诉求 / 239
- 丝绸之路开辟动因（丙）：宗教传播 / 242
- 丝路前瞻 / 245
- 汉胡交融的积极效应 / 247
- 纳佛·斥佛·儒佛交融 / 249
- 郑和下西洋：卓越成就与历史局限 / 252
- 马戛尔尼使团晋见乾隆：聋子间的对话 / 255
- 从闭关锁国到门户被动开启 / 258
- 睁眼看世界 / 260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与驻外使节派遣 / 263
- 向西方求真理 / 266
-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268

全方位自主开放 / 270

西学东渐论略 / 273

中日交际 / 283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国与日本 / 284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总序 / 291

《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序言 / 294

《朱舜水东瀛授业研究》序言 / 296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序言 / 298

日本江户时期“国学”对“汉学”的疏离 / 302

中日间关于对方国情的“信息不对称” / 314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 321

日本对侵略战争史缺乏深刻反省的因由 / 333

《新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序言 / 347

《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导论 / 349

古典开新 / 357

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20 世纪末札记 / 358

一、凡尔纳预言与 20 世纪现实 / 358

二、“居安思危” / 361

三、现代化：善恶、苦乐“俱分进化” / 364

四、“现代病”之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 366

五、“现代病”之二：人的异化与社会的失衡 / 373

六、疗治“现代病”：东西方智慧联合会诊 / 378

七、东方智慧的历史命运 / 383

八、整体观与螺旋演进论 / 388

九、文明悖论 / 391

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 393

十一、“和谐”与“中道”——可持续发展哲理之源（一） / 396

十二、“绿色意识”——可持续发展哲理之源（二） / 399

十三、太极图启示 / 402

十四、古典智慧提供历史借喻，而非现成方案 / 404

“国学”讲习当健康展开 / 408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弁言 / 414

文化的保守与更革 / 416

王葆心——从传统士子到近世国学大师 / 428

《唐人重译〈妙法莲华经〉》收藏记 / 432

|| 转型界说 ||

本书所谓“转型”，指中国近代发生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的大尺度变革。然社会的异动性与常驻性、文化的变易与不易，在转型过程中共存。

近代中国：多层次变革交叉互叠

一

不同时代的人们立足于各自所处的“当下”，将无限悠长、深远的时间之流划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从而形成各自的“古今观”。清人段玉裁（1735—1815）说：

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①

由“古”向“今”的转换，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要面对的问题。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商君书》将历史区别为“上世”（约指西周时期）、“中世”（约指春秋时期）、“下世”（约指战国时期），并作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②的判断，从而揭示出价值重心和文化取向的古今演绎。汉代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曾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确立一个宏阔的目标：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

①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② 《商君书·开塞》。

③ 《汉书·司马迁传》。

其中，“通古今之变”便是考察历史进程的规律，也可以说是研讨当年历史及文化的古今转换。

今日我们所面临的传统社会及文化的近代转型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题目，它既与运作已久的“古今之变”一脉相承，同时又包蕴着丰富的新内涵。简言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如果说，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发生着文化的局部量变，那么，“文化转型期”则指文化发生全局质变的阶段。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近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生命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采集、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征服自然”所需要的“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

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变迁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份演变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

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偏执转向理性、迷信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所享有。

传统的农业文明向近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二

人类文化史大略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文化（人类诞生至公元前4000年）—农业文化（公元前4000年至18世纪）—工业文化（18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信息文化（20世纪70年代迄今）。

从全球范围观之，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即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过渡）

是以 15—16 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其文化标志；这一转型的大规模展开则是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是启蒙运动。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化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近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 15 世纪的近代转型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为“内发自生型”。对于所有其他地区而言，近代化过程则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近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因而其近代化呈“外发次生型”。欧洲以外地区（严格意义上应是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近代化过程，又大略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文明进入前夕，当地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较为便利地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与加拿大）和澳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近代化基本上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访问过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都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另一种类型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及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台克、印加，都有着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地域虽然尚滞留在“前近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及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地域的近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域的近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还要面对文化的民族性传承。这两者间虽不乏统一性，却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段相互矛盾、彼此抵牾。对于此类“外发次生型”近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不可失察。曾经颇有影响的“民族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或固守内因一隅，或偏执外因一端，都不能全面、深刻地诠释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

三

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近代转型，人们一般以 19 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

也即西方资本主义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为其端绪，这是大体不错的。但如果从外因与内因相统合的高度加以观照，从中国历史的纵深度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自明代中叶（16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及文化已隐然呈现走出中世纪的某些征兆，如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还包括晋东南等少数北方地区），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渐成规模，出现某种从“农本”向“重商”转化的苗头。与之相伴生，在观念领域，初露“破块启蒙”的动向，诸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1610—1695）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君王的抨击，对君臣之间从主奴依附向平等同事关系转化的期望，对学校议政、“工商皆本”的倡导，都昭示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迫近。方鹏（约1521年前后在世）、归有光（1507—1571）、毛奇龄（1623—1713）、俞正燮（1775—1849）等人对戕害女性的“节烈观”的批判^①，也有类似意味。即使是清学的主潮——乾嘉考据学，虽然弥漫着古典气息，但其间洋溢着理性—实证精神，将“神圣”的经书还原为历史典籍的努力，其对经学传统的解构作用，也为观念文化的转换准备着条件。

中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固然出现了某些时隐时现的新文化因子，但由于整个社会尚未达到转型阶段，缺乏强劲的经济—政治助力，少数先觉者的呐喊，其规模和力度都远不足以掀起大波；社会上出现的某些“走出中世纪”的动向，也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在状态。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社会及文化仍然徘徊在中古故道，中国尚处于15、16世纪以来已经开始的世界性近代化过程之外，其典型表现便是1793年（约与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同时）乾隆皇帝（1711—1799）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1737—1806）勋爵时所显示的“集体孤独症”^②，尤其是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的复信所宣称的“天朝德威远被”，“无所不有”，^③生动地表明，中国人当时还自认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④。这种情形迁延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以炮舰、鸦片和商品打破清王朝封闭的国门，以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为基石的中国社会逐步被纳入世界统一市场，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开始与风靡全球的西

^① 参见方鹏《矫亭存稿·风俗》、归有光《贞女论》、毛奇龄《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俞正燮《贞女说》，戴震（1723—1777）对“以理杀人”的深沉谴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故程朱所谓之“理”，“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

^{②③④}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26—330页。

方近代文化相交会，这样，中华传统文化在尚未达到自我扬弃以实现时代转换的时刻，便因遭遇外来近代文化撞击而进入剧烈的转型期。陈寅恪（1890—1969）称其为“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①。此语表达了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空前激变性和复杂性。

四

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首先表现在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打断中华文化自身进程的情形下发生的。正如向人体移植器官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近代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中国的近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组矛盾。中国学界、政坛自19世纪末叶开始，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然聚讼纷纭的“体用之辨”，正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过程中时代性转换与民族性维系之间复杂关系的形而上反映。

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还表现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其原因是中国人经历的这一转型过程，较之西方存在一个“时间差”，以致西方人数百年间解决的问题，一齐挤压到一个世纪间，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因此，近代文化的生成期，中国比西方短促，而生之急骤，必成之单薄，需要后人加倍努力。中国近代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中西古今”的层累式积淀，呈现“多重”性状，使中国人不易从容应对。早在1919年，鲁迅（1881—1936）便描述过现代中国的“多重”性状，今日读来仍有切肤之感：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②

有着宏阔世界眼光的孙中山（1866—1925），也对近世中国的“多重”任

^① 陈寅恪：《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② 鲁迅：《热风·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务深有体悟。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倡导者，主张学习西方，同时又深悉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故力求中国在资本主义“祸害”“未萌之际”便加以防范。他于1905年撰写的《〈民报〉发刊词》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就是试图对现代中国面临的“多重”问题作一总体式解决。这一构思当然包含着主观空想成分，缺乏可操作性，却又蕴蓄远大，富于创识和预见，对面临类似问题的今之国人，仍颇具启迪意味，并提供了宝贵的思维教训。

五

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亿万中国民众在长达3个世纪间经历着的伟大社会实践。纵观这一起伏跌宕的过程，仅就观念文化的转变而言，有几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一为明清之际（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继之隐遁，却又如地火潜行；二为清道光、咸丰年间（19世纪30—60年代），内忧外患的刺激，使得经世实学和今文经学勃发，构成传统文化走向近世新学的桥梁；三为清同治及光绪前中期（19世纪60—90年代），随着“洋务新政”的拓展，西学输入渐成规模，新教育雏形初现，早期改良思潮由孕育而兴盛；四为清末至“五四”，发端于甲午战败激起的国人觉醒，又历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世新学形成、发展，并渐成主潮，新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走上历史舞台；五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大潮使现代化进程赢得加速度，并与世界接轨，观念文化逐步寻觅到时代性进步和民族性发扬相统一的路径，中国现代化呈现蓬勃气象，同时又面临诸多挑战。

六

197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在世界信息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潮的时代氛围中，中国抓住发展机遇，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展开变革，从而把清中叶以来起伏跌宕的社会及文化转型推向高潮。其运行速度之迅疾、包含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难觅先例，综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罕见其匹。

近三十余年来的社会及文化转型，一个显著特点是，把世界上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课题都集结在此间展开。简言之，包含三个层级的变革的交叉互叠：

（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

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程度在50%~60%，故197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还要继续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未竟之业。2005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6%，世界排名第56位，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或称半现代化国家。估计在2050年中国方可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①总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启蒙”的呼唤，便是此一转换间的文化诉求。

（二）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动员式的现代化进路，曾取得实绩，但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苏联模式（中国20世纪50—70年代中期模仿此种模式）的扬弃，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从而加速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

（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转化

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取得“后发

^①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优势”。而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因袭的弊端，也潜伏着“后发劣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呈现在当今中国面前，亟待我们解决。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2005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0%，世界排名第51位，较之发达国家，如瑞典的105%、美国的109%、日本的102%还有很大差距。^①两次现代化叠加，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改革开放30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可持续发展及生态问题的提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追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倡言，都是向后工业文明转换的产物。

总之，三十余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今转换，其面对的，不仅仅是古典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还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与深刻。例如，考察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转换，不仅要看到它们是构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资源（如发掘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还要开掘它们所具有的深远的后现代意义。肯定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不可忽略的另一个基本点是：非欧地区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简单搬迁，非欧地区的固有文化形态没有排除在近代化进程之外，而是深深楔入这一过程之中，并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发生复杂的化合反应。这便要求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不能限于讨论西方近代思想如何输入中国，更要考究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历史条件下，中西思想如何从相互冲突走向彼此涵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经历烈火洗礼，实现凤凰涅槃。因此，讨论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必须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华中心论，从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大视角，观照中学与西学在近代文明的背景下发生的深刻互动。

正确估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还必须克服直线进步史观带来的蔽障。统观人类文化的进程便会发现，文化的演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一个螺旋圈层内部，作为终结的第三阶段（“合”）综合着前两个阶段（“正题”与“反题”），履行着在新的更富有内容的统一中扬弃其片面性的

^①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第276页。

功能。宗教改革对希伯来元典的重演，唐宋古文运动在文体上对先秦两汉的复归、思想上对原始儒学的复归，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对先秦的复归和对三代之制的崇仰，均为例证，而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元典精神则进行了又一次复归，更为显例。今日的思想界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正对元典精神酝酿着新的创造性复归。这是我们考察传统思想现代转化时应予关注的一个方面。

（本文系《中国文化创新蓝皮书》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近代转进三期说

自清末民初以来，思想者对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感触渐深，从龚自珍、魏源、王韬、郭嵩焘到康有为、容闳、章太炎，有种种概括，而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提出的文化进化“三期说”较为平允、系统，我们正可据以为基础，加以修订，形成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转进的较周到的评述。

中国文化近代转化，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而国人自觉到固有文化的“不足”，亟须更张，是社会转型或曰社会进化的枢机所在。关于这一枢机，对文化转型有切身感受的梁启超作过富于历史向度的阐发。1922年4月，梁启超为《申报》五十年纪念作文曰：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知。”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①

梁氏把近代中国人自觉“不足”、谋求更革的努力分为前后递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②

^{①②} 本文申报馆1923年2月发行。后定题《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第三十九卷。